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十九)

A Study of Taoism and Its History

道家·道教史的研究

(日) 酒井忠夫 著

曾金蘭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道教學譯叢(之十九)

道家·道教史的研究

(日) 酒井忠夫 著
曾金蘭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道家·道教史的研究/[日]酒井忠夫著;曾金蘭譯. —濟南:齊魯書社,2017.1

ISBN 978-7-5333-3682-0

I. ①道… II. ①酒… ②曾… III. ①道教史—研究—中國 IV. ①B95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309889 號

道家·道教史的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曾金蘭 譯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1.25

插 頁 2

字 數 3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682-0

定 價 38.00 圓

本書由香港青松觀資助出版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爲序)

周和來 林國柱 莫小賢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鄭康勤 蕭炳強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丁 煌 [日]山田俊(Yamada Takashi) 王 卡

王宗昱 王承文 [法]呂敏(Marianne Bujard)

呂鵬志 朱越利 李 剛 李之美 李遠國

李豐楙 [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莊宏誼 [法]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

郭 武 陳 敏 陳 霞 陳耀庭 孫亦平

黃海德 [日]麥谷邦夫(Mugitani Kunio)

[德]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

[韓]崔珍哲(최진석)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萬 毅 程樂松 [法]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雋雪艷 [法]勞格文(John Lagerwey) 詹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日]橫手裕(Yokote Yutaka)

樊光春 黎志添 [美]劉迅(Liu, Xun) 劉仲宇

蕭登福 龔鵬程

本書責任編委 丁 煌

學術秘書 宋學立 王皓月

總 序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占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占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祇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贊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官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杰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儘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却隔著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巔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譯者序

2012年4月，恩師丁煌教授向我徵詢是否願意翻譯日本學者論文，當時自忖日文程度可能不足以譯出生動優美且有水準的譯文，恐有損大師論著之權威，躊躇再三，幾經思考後，決定接下這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由於丁老師希望我能先翻譯福井康順先生和酒井忠夫先生兩位學者的論文，因此接下來的幾個月即在尋找原著、撰寫提案和等待家屬的同意之間過去。待同年8月，獲知可先從翻譯酒井忠夫先生的大作開始，當時手邊正忙著撰寫出席會議的論文，故譯書進度暫時擱置；之後得便即著手進行，但僅譯完45頁，又因某些客觀因素而擱置。2013年2月得朱越利教授告知，可盡速進行，故三四月間即正式啟動翻譯工作。

酒井忠夫教授早於二戰期間即參與在中國調查民間宗教結社的工作，當時出版了《近代中國宗教結社之研究》（東亞研究所1944年版），此書後經增補，於2002年以《近現代中國的宗教結社研究》為名，成為酒井先生著作集中的第六集。而同樣基於二戰期間調查的研究成果《中國幫會史的研究——紅幫篇》《中國幫會史

的研究——青幫篇》，也分別以著作集中的第三與第四集，於1998年和1997年出版。而其早在1960年即由弘文堂出版的《中國善書的研究》，也在酒井教授的增補下，於1999年和2000年再次刊行，成為著作集的第一與第二集。而原本欲列入著作集系列，於2009年夏季完成增補並改訂舊稿《明代的日用類書與庶民教育》的工作，後因先生的視力與體力日衰，而未及完成，乃於2011年1月另以《中國日用類書史的研究》為名發行。由於酒井先生的研究緊扣著中國民間宗教與社會文化，故對道教的研究著力甚深，^①這本《道家·道教史的研究》，雖是酒井先生著作集的第五集，却是最後出版的一冊，其內容總結了酒井教授對中國社會、宗教與文化研究的觀點，也是表現整部著作集在思想史觀上的集成，因此具有相對的重要性。

道教係源自中國的宗教，有其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與複雜內涵，因此對外國學者而言，是一種相對來說難以界定的宗教。美國學者柯恩(Livia Kohn)即認為：“說它是地方宗教，它並不典型；說它是世界宗教，亦不明確；道教兼有地方性宗教和世界宗教的特徵。”^②歐洲

① 酒井先生早在1937年即於《中國佛教史學》發表《道教史上より觀たる三張の性格》，1939年在《東亞研究所報》發表《道教に関する研究諸文獻》，其後分別於1949年、1951年發表有關道教研究的動向，並於1972年於《東方宗教》發表《日本における道教研究》，召開“第二回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編著出版《道教の総合的研究》(國書刊行會1977年版)等書。有關酒井先生的簡略年譜與著作表，可參照“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の會”編《酒井忠夫先生略年譜研究業績一覽》，《歷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第3~13頁。

② [美]柯恩撰，李明譯：《探索新的研究領域——北美道教研究趨勢概覽》，見朱越利編《理論·視角·方法——海外道教學研究》，齊魯書社2013年版，第193頁。

學界對於這個充滿神秘且內涵豐富的宗教產生研究的興趣，並視之為專門的研究領域，應以法國漢學家沙畹(Chavannes, Edouard)對泰山和投龍簡的介紹性研究為最早。但若要論及法國漢學界第一位真正的道教研究專家，則非馬伯樂(Maspero, Henri)先生莫屬。馬伯樂先生將道教自中國古代宗教分離出來，並嘗試對道教的宗教傳統如信仰、儀式和道術的內在體系等進行梳理，而其所建立的研究方向，也成為其後學進一步努力的目標，康德謨(Kaltenmark, Maxime)先生即是在馬伯樂研究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對文獻考據和經典分析進行專題性的研究。而19世紀以來法國宗教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理論給予法國道教研究者的啓發，即是突破傳統漢學研究的囿限，將眼光轉向“非官方”的民衆宗教與文化傳統，認為必須經由這樣的文化理解，纔能正確定位道教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功能和獨立性。^①

由於法國的漢學研究很早，因此福井文雅先生認為，自17世紀後半期起，歐美漢學研究的主導權似乎即掌握在法國人手裏，^②故而法國學者的道教研究作品與方式，也給予日本道教學界很大的刺激。其中馬伯樂與康德謨前後兩位學者，更是對學界有重大影響的重量級人士，其著作被譯為日文後，影響是廣泛性的。酒井忠夫先生在本書中，首先即針對此二人之論著進行介紹與評論，並指出其不足之處。例如在序論中，先指出馬伯樂教授對中國道教

① 參考程樂松：《借鏡與對話——漢語視野中的法國道教研究》，見朱越利編《理論·視角·方法——海外道教學研究》，齊魯書社2013年版，第10~15, 19~25頁。

② [日]福井文雅：《歐美的道教研究》，見福井康順、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監修《道教》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頁。

發展的偏頗或單方面的觀察，以提出作者個人及日本學界對相關議題研究所呈現出的不同意見，或是對相關議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在介紹康德謨教授《老子與道教》研究的內容時，認為其未提及宋代以後的新道教（即民衆道教）、未論及道教與儒家的關係，以及用基督教神秘主義來論道教信仰，其中最被詬病的就是未考慮儒家與道教的關係，酒井先生認為這是兩位早期法國道教學者研究的最大缺憾。由此也定義了本書所欲建立的道教研究史觀，必須是築基於儒家與道家（或儒教與道教）密切相關的基礎上，纔能呈現最接近事實的全貌。

酒井先生所說確實指出了某些事實，但當我們瞭解到馬伯樂的《道教》一書，是在他病死於納粹集中營後，由同事戴密微從大量的雜亂筆記和片斷文字所編纂而成，^①就可理解酒井先生的指摘，其實應視為歐洲與日本道教研究在方法及思想進路上的比較。亦即歐洲漢學界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為主流的宗教研究視野下，對中國宗教所抱持的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與日本基於“同文同種”的東方思維所進行的中國宗教研究，在結果上所呈現的差異性比較。早期日本的道教研究，多由研究佛教而兼及道教研究，但初期多著重於文獻的解讀，自小柳司氣太（1870—1940）先生開創實地調查中國道教的先河以來，日本的道教學界即發展為既重視文獻研究，同時也重視實際田野調查的模式。此後有名的道教學者如福井康順、吉岡義豐、道端良秀、大淵忍爾、麥谷邦夫和蜂屋邦夫等，足迹即深入中國各地官觀，所完成的考察報告與研究紀錄，也成為後學

① 戴密微先生在馬伯樂《道教》日譯本的序中所寫的事實，參考福井文雅前引文，第238～239頁。

參考的重要資料。酒井先生為日本道教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本為東洋史學科出身，早年關注於中國的泰山和十王信仰，二戰期間赴上海東亞研究所工作，即專注於有關幫會等民間宗教結社的議題。故這本《道家·道教史的研究》，主要以歷史學者的角度，用歷史學的方法來研究道教，全書隨處可見溯源、考證、歸納和整理的工夫；但本書同時也採用了類文化人類學和宗教社會學的方法，以實地調查成果來研究非官方、非精英的民衆宗教結社和民衆文化，使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深切感受到作者深厚且廣博的學養、縝密的思維，同時也察覺到歐洲與日本漢學界在道教研究的區別。

如前所述，本書雖是酒井忠夫先生著作集的其中之一，但其內容却涵蓋廣泛，某些章節的內容且與著作集的其他已刊卷內容有所呼應、修正、補充，或是進行整體概念的整理，完整表達作者對中國道教的歷史觀。

綜觀酒井先生此書內容，特別重視道教與儒家的關係，原因無他，因儒家是支配中國政治體制的主流，在此體系下，其與道、佛所建構成的三教關係就成為值得注目的焦點。酒井先生建構此思想主軸時，甚為推崇陳榮捷教授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Columbia Univ. Press, 1953) 一書^①，但對於有關青幫或紅幫以及部分清末民初等宗教結社的意見不同，其結果呈現在酒井先生著作集 6 的《序說》和該書後半增補的部分。而進一步的論述，則是本書論述的主要內容：前篇著重在思想、政治和經濟層面的討論；後篇則探討宋以後的儒道關係，即所謂新道教時期，特別聚焦於歷代善書

① 日譯本由福井重雅譯，《近代中國における宗教の足跡》，金花舍 1974 年版。中譯本由廖世德譯，《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文殊出版社 1987 年版。

編輯的研究，這也是酒井先生所重視的宗教與社會、經濟的關係，以民間信仰和宗教結社的範例來切入，呈現中國道教研究，從上層結構轉入民間社會的實際運作趨勢。

先生的治學功力，表現在各個小議題的論述當中，例如對於五斗米道與太平道的區別，調查稻米的分蘖度；在論述老莊之道是否存在宗教的“神”這種概念時，酒井教授從老子和莊子所處社會的差異，以水田生產力具備自給自足能力的社會和商賈末業盛行的游俠社會相對比，以此呈現何以莊子之道較老子多一些神仙氣息。這些研究法使議題凸顯出多面相的面貌，使讀者在閱讀道教如何發展成為宗教的過程中，經由酒井教授對史實的仔細梳理和分析，而產生深入現場、身歷其境的真實感，這就是酒井先生所欲建立的，從與道教相關的思想、社會和經濟三要素所架構的“立體式”的研究法。

酒井先生事事追求完美的個性，譯者在翻譯時亦深有所感，因此書中有部分內容似乎感覺到語氣未完，意猶未盡。這些感受在丸山宏先生的後記，以及收入附錄的野口鐵郎先生悼念文和山田俊先生的書評即可清楚看到。例如野口鐵郎教授指出：酒井先生在極其有限的時間中，仍思考著增加新的資料和改換文章的措辭，因此在酒井先生未及校改即故去後，本書還遺留著大量的檢校稿。因而本書在結構上即如同山田俊先生所指出的：本書原以《中國人的宗教與道教的成立》為題而重新整理其著作的內容，全篇以儒道經緯共偶的關係作為論述主軸（即野口鐵郎先生所說的“大動脈”），貫穿與聯結各章所述內容；而後篇數章有關善書的內容，更如同著作集1、2的濃縮版，而其他與宗教結社有關的章節，內容亦多半是既述內容的補充與修正，可說是扣著《著作集》全卷的整體

面貌而與之相互呼應的一卷。因此，本書可說是整部《著作集》最重要的一卷，可讀本書而知其餘諸卷之梗概。祇可惜天不從人願，未及完整呈現，酒井先生即撒手人寰，而丸山宏先生在接手校對稿件時，即因此而頗費時日。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酒井先生所論述的部分內容即感到困惑，例如在後篇序說（原書第 200 頁）論述金丹道之時，酒井先生認為集全真教南宗的金丹道大成者為南宋道士白玉蟾，但接著又道：“白玉蟾は、全真教の道士趙友欽から内丹法を授けられた。”易使人認為白玉蟾之丹道係來自趙友欽。按白玉蟾生卒年雖有爭議（1194—1229 或 1134—1229 甚至有人主張至元代仍存活），但基本上是活躍在南宋時期的人物；趙友欽則是南宋末至元末時人（生存年代有二說，1271—1335 或 1279—1368）。暫且不論白、趙二人是否存在傳承關係，就時間先後而言，譯者認為酒井先生欲表達者應為玉蟾傳授丹法予友欽，故以合理的方式譯出。

又如在第十五章（原書第 347 ~ 348 頁），酒井先生在叙及蓮善之父出家的情形時，接著即道：“蓮善はこれより出家して五台山の極樂寺に進香し削髮して僧となった”。譯者譯及此處，十分不解酒井先生之意，因為據引文所述，蓮善之父因“失偶……由是出家”，出家之人應為蓮善之父，故纔能在極樂寺削髮為“僧”，而非女兒蓮善。所以酒井先生的原文比較可能是“蓮善の父はこれより出家して……”，纔符合引文所說的情況。然而酒井教授於下一段的深入敘述時，又指出孫蓮善入極樂寺普濟禪師門下，係在光緒十三年（1887—1888）左右，亦即其母逝世（光緒十年，1884），蓮善在家守喪三年後，也就是孫父至五臺山極樂寺出家之同一年。這